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6.04.001

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社会使命

金 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标志着中国金融发展进入了以多维社会使命为导向的新阶段。本文首先梳理了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中金融使命的叙事演变,从古典的“货币中性”观点,到基于凯恩斯主义货币非中性理论的“微观-宏观”二元框架,到以增长、就业、通胀为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再到嵌入具体社会场域的“域观经济”范式演进,凸显了金融社会属性的日益增强。其次,本文剖析了货币金融功能从提升经济效率到增进社会福祉的深层逻辑,论证了“五篇大文章”实质上是金融功能在新时代服务于广义社会目标的系统性拓展,为“社会金融”的领域拓展奠定了体制逻辑自洽的实践基础。最后,本文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探讨了金融发展中自发性市场力量与建构性政策引导的辩证关系,提出完成好“五篇大文章”需要实现适应性效率与社会性目标的有机统一。在这一进程中,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创新至关重要,而两岸基于共同关切的金融协作可为这一宏大的社会金融实践贡献独特力量。

关键词:金融“五篇大文章”;社会使命;社会金融;中国式现代化;金融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6)04-0001-11

引用格式:金碚. 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社会使命[J]. 西部论坛, 2026, 36(4): 1-11.

Jin Bei. The social mission of the “Five Priorities” of the financial sector[J]. West Forum, 2026, 36(4): 1-11.

* 收稿日期:2026-06-24

作者简介:金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辽宁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发表学术论文 500 多篇,出版专著 40 余部;曾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获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著作奖、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等 20 多项国家级或部级学术嘉奖。

一、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系统运行的血脉,其角色与使命始终随着经济态势形态与社会诉求的演进而不断重塑适应性形态和运行目标机理。按现代经济学的传统范式逻辑,金融的核心使命叙事被锚定于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支付清算等经济效率层面。然而,随着全球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科技革命冲击等系统性挑战日益凸显,金融活动的发展空间和关切领域不断扩大和多维化,金融体系能否以及如何回应超越经济行为目标的现实诉求,实现日益广泛的社会关切目标,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正是对这一时代课题和现实挑战的适时回应。随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部署工作时亦反复强调金融工作的重大社会使命。2026年6月17—18日在上海举办的陆家嘴论坛对金融发展与合作的深刻研讨,凸显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意义,其并非孤立的技术性议题或一般性政策安排,而是构成了一个具有深刻关联的有机整体,指向金融体系在新时代所须承载的复合型社会功能和被赋予的艰巨使命。

本文将金融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叙事框架中进行审视。首先,追溯现代经济学对金融功能使命认识的流变,揭示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范式迁移。其次,深入货币金融功能的内核,论证其效率生命与社会使命的一体两面性,阐明“五篇大文章”是金融功能在新时代的必然升华。最后,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探索,论述完成这“五篇大文章”所需达成和平衡的多元目标,以及各类主体在其中应扮演的角色,特别探讨两岸金融协作可能贡献的特殊社会价值。本文旨在论证,“五篇大文章”的提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金融发展正从侧重经济维度的“商业金融体系”,迈向深度融合经济绩效与社会目标的大变局时代“社会金融体系”新阶段^①。如果将“商业金融—社会金融”作为各类金融活动性质的分布轴线,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五篇大文章”的提出和实践表明,中国金融活动和系统建构的行为目标分布,正趋于向更关切社会金融端表现的方向演进和升华。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叙事体系中的金融使命

对金融社会使命的理解,应植根于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演进之中。从将货币视为实体经济的“面纱”,到视其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变量,再到认识其嵌入并塑造特定社会场域的复杂功能,金融的“社会性”角色形态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即从商业金融主导逐渐向具有更广泛关切的社会金融方向兼容。

1. 货币从“特殊商品”发展衍生为社会信用关系的金融中枢

古典经济学深受“货币中性论”影响,将货币视为价值计量和便利交易的“特殊商品”,认为其是覆盖在实物经济上的一层“面纱”,核心使命是作为价值尺度与交易媒介,以减少物物交易的成本,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理想的资源均衡配置状态。此时的金融活动主要依附实体经济,更多地是作为服务性中介因素,以畅通货物交易过程。然而,随着信用货币取代商品货币,货币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它不再是本身具有价值的商品,而是基于国家主权和法律保障的社会信用关系的集中体现和承载系统。货币的发行、流通与回笼,映射着整个社会的信任网络、权力结构和未来预期。由此,金融体系演变为现代经济

^① “社会金融”一般指以实现一定的环境质量和目标为企业行为方向、以市场化金融操作为手段的金融形态或金融机构;广义的社会金融则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肩负社会使命的金融行为。

的“中枢神经系统”，不再是仅被动地反映实体经济，而是通过信用创造、资本配置和风险管理，主动地，且深刻地参与并塑造经济社会的运行轨迹。这一转变，为金融承载广泛社会使命埋下了伏笔——既然货币是社会的信用契约，那么金融活动便天然具有了公共性和社会性特质，并表现为关切维度的拓展。经济学说史展示，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就是着眼于对劳动就业目标的关切。以此为始，货币的社会使命日趋扩展。

2. “微观-宏观”范式：微观经济的“看不见的手”调节与宏观经济的政府总量调节

基于对劳动就业目标的关切，即着眼于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产生了以货币非中性叙事为逻辑底基的所谓“凯恩斯革命”。据此，二十世纪的经济学确立了“微观-宏观”的二元分析范式。在该叙事体系中：微观层面，金融是市场机制的一部分，通过利率（资金价格）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保持市场供求均衡并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追求个体和局部的资源配置最优效率；宏观层面，以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总量分析为叙事逻辑，将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上升为国家进行总量调节、平抑经济周期的核心工具。中央银行（如美联储）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影响总需求、引致总供给，其操作被视为超越微观市场个体决策行为机理的集体（总量）理性行为机制（顶层设计）。在这一范式承诺下，金融的社会使命由宏观政策目标所界定，金融体系成为政府实现其宏观经济治理意图的重要传导渠道和运作手段。

3. 就业、增长、通胀：金融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主要社会使命目标

据上所述，按“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经典叙事，金融的社会使命被高度概括并集中于实现宏观经济的几大核心目标：充分就业、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控制通胀）。美联储的“双重使命”（就业最大化与物价稳定）便是其典型体现。这些目标本身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就业关乎民生与社会稳定，增长关乎国力与民生改善，通胀关乎居民财富与社会公平。因此，金融的社会使命可以通过着力于这些宏观经济目标而间接得以实现。但这种总量性、周期性叙事的社会使命内涵，关切的是经济系统整体的平稳与扩张，而对增长的结构、质量和收益分配等维度的关切不足：假设其可以通过微观-宏观机理得以实现，无需其他干预。

4. “微观-宏观”向“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演化：金融在各域场中的社会使命不断增强

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数字化、绿色化等趋势交织，而且经济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世界进入大变局时代，经济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化和域观化（“多元化”）特征。传统“微观-宏观”二分法叙事体系难以充分解释诸如科技创新、区域发展、产业生态、环境治理、社会包容等现实“域场”的运行机理和秩序形态，域观经济叙事体系应运而生。“域观经济”范式承诺的叙事体系，反映了经济行为与制度、文化、技术、生态等现实域场条件的共生、互动和演化。在这一叙事体系下，金融的社会使命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要服务于宏观总量目标，更要深度融入并推动特定社会领域民生福祉的健康发展。

金融在“科技域场”中的使命是催化创新、分解风险；在“绿色域场”中的使命是内化环境成本、引导低碳转型；在“普惠域场”中的使命是促进机会均等、修复市场失灵；在“养老域场”中的使命是平滑跨期消费、应对人口结构挑战；在“数字域场”中的使命是创塑金融新形态，实现数字时代的金融安全与包容。这些社会性使命是结构性、多维化和具象化的，直接触及经济发展的质量、可持续性与公平正义等深层社会价值。金融活动由此展现出鲜明的“社会金融”特质——其社会嵌入的运作逻辑、产品设计、风险管

理必须与特定社会域场的核心诉求及运行规律紧密结合,因此,金融体系本身也成为承载并协调多元社会目标,即社会使命日趋突显的重要“域场”。

总之,传统经典经济学范式体系的金融活动目标关切的多元化,表明现代主流经济学叙事体系的货币金融功能被赋予更大社会使命,其“非中性”特征日显突出,可以据此写就各篇“大文章”。

三、货币金融功能的效率生命与社会使命

货币金融体系之所以能承载日益多维的社会使命,根源在于其核心功能具有提升效率与社会福祉的二重性。效率是其在市场经济中存续的“生命线”,而增进社会福祉则是其功能发挥的价值拓展和时代指向。

1. 货币金融中枢在现代经济中的功能和社会使命

货币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提供流动性和畅通交易,从而跨越时间和空间转移和配置经济资源。因而,货币量可以被技术性地称为“流动性”。这一过程的核心功能是促进经济资源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配置,即提升资源的经济效率。货币金融具有积累增值性特质,因此,高效的金融体系能加速以货币积累为经济形态的资本形成,支持最具成长性和生产力(表现为价值增值)的企业和项目,从而驱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创造和积累更多社会财富。反之,金融只有不断有效发挥这样的功能,即体现高效率,其自身才能具有可持续的生命力。因此,“效率生命”是金融发展的根基,金融须具有效率生命,才能有社会贡献。

然而,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价值无涉。在古典经济学意义上,“效率”往往指短期的、财务的、私人的回报最大化。但当将视角扩展至长期、社会整体和代际公平时,“资源有效配置”的内涵就更加丰富多层。例如,将资源引导至能产生正外部性(如基础科研、生态保护、教育普惠)或减少负外部性(如污染)的领域,尽管不体现为个体的财务报偿,但仍然是“有效”的,而且可以是“高效”的,因为其增进了社会总福利,具有超越工具价值和本真价值。金融的社会使命,正是要求其功能发挥从服务于狭隘的私人经济效率,转向追求更广泛、更长期的社会总福祉。金融的效率生命与社会使命在此实现统一:一个能够敏锐识别并将资源引导至真正提升社会长期福祉领域的金融体系,才是最具生命力和可持续性的高效体系。

2. 增进经济效率与社会福祉的金融“五篇大文章”

金融“五篇大文章”正是上述逻辑在新时代的具体化和系统化展开,每一篇都指向一个关键的社会经济场域,旨在通过金融功能的创新性发挥,同时提升该场域的经济效率和整体社会福祉。

(1) 新时代的科技金融。科技金融的社会使命是充当国家创新体系的“催化剂”和“稳定器”。其经济效率体现为给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资本支持,解决市场在早期研发和基础研究领域的“失灵”问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其社会福祉维度则更为深远:通过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保障产业安全与经济独立自主;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为长期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就业提供根本动力;最终服务于建设科技强国、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宏大社会目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学”与“技术”具有不同的性质、发展机理及功利取向,如科学发现主要具有署名权(非盈利性),而技术发明则可拥有专利权(盈利性)。当“科学”和“技术”高度融合为“科技”形态时,需要有相应的具有高度甚至颠覆性创新性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机制予以支持,这也是新时代科技金融的一个重要社会使命。

(2) 关切环境的绿色金融。绿色金融的社会使命是将生态环境这一传统上被视为“公共品”的因素，内部化为经济决策的核心关切。其经济效率体现为通过绿色信贷、债券、保险、碳金融等工具，引导资本流向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生态修复等产业，帮助经济体以更低成本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规避未来因环境约束和气候风险带来巨大财务损失。其社会福祉维度直接关乎人类的生存基础与代际公平：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治理环境污染，为当代和后代创造可持续的生活生产环境。

(3) 关切公平的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的社会使命是修复因地理、成本、信息等因素导致的金融服务“排斥”现象，促进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增长。其经济效率体现为挖掘曾被忽视的“长尾市场”（小微企业、农户、低收入群体）的潜在经济价值，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更全面的资源配置优化。其社会福祉维度至关重要：保障基础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是一项基本人权；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是保障就业、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途径。普惠金融曾是社会金融的主要形态和突出代表（小额信贷、具有“穷人银行”之誉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等），在新时代，其形式更为丰富，社会功能更为广泛，且覆盖产业趋向于高新技术领域。

(4) 体现人本的养老金融。养老金融的社会使命从主要关切劳动就业上升到关切人的终身福祉，特别是老年关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全球性挑战，并实现从“以劳动力市场为中心”的金融支持，到“关切全生命周期福祉”的金融安排的范式转变。其经济效率体现为通过养老金体系、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反向抵押等金融工具，平滑个人一生的消费与储蓄，实现养老资产的保值增值，缓解公共养老金体系的支付压力。其社会福祉维度直指人的尊严与幸福晚年：确保老年人享有稳定、充足的经济来源，减轻家庭赡养负担，推动银发经济发展，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5) 数字金融赋能现代金融。数字金融是货币非中性的升华和货币金融形态的颠覆性创新进化，其社会使命是重塑金融基础设施，为其他四篇“大文章”提供技术赋能，并催生新的社会金融形态。数字金融可以极大地提升传统金融功能的效率（包括支付速度、风控精度、服务半径等），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货币流动性，更重要的是，其颠覆性地深化了“货币非中性”理论：数字技术（如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不仅改变金融的交易方式，更重塑货币的本位形态（数字货币）、信用的产生机制（基于数据的信用评估）和金融的权力结构（去中心化金融）。其社会福祉维度则具有双重效应：积极面是极大地增强了金融的普惠性和便利性，挑战面是可能带来数字鸿沟、数据垄断、隐私侵犯和系统性风险。因此，数字金融的社会使命还包含引导技术向善，确保数字时代的金融安全与公平。

3. “五篇大文章”是新时代的广义社会金融

综上所述，金融“五篇大文章”超越了传统金融服务于周期性宏观经济管理和个体市场效率的范畴，它们共同指向一系列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关乎发展质量与人民福祉的社会目标：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公平、老龄化应对、数字治理等。这就要求金融系统必须主动调整其运行逻辑、产品服务体系、风险管理标准和绩效考核导向，深度嵌入实现这些社会目标的进程中。因此，可以说，“五篇大文章”在本质上是广义社会金融在中国语境下的战略聚焦和任务部署，意味着金融部门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社会账”“生态账”“长远账”，在追求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自觉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国家战略的使命。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金融文章

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提出与实践，深度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道路探索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

口规模巨大、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为金融的社会使命赋予了更丰富、更具体的中国内涵，提出了更高的统筹协调要求。积极推进金融“五篇大文章”实践可以书写出具有独特创新性的丰富多彩的社会金融文章。

1. 现代金融的经济组织与创新发展：自发性与建构性的实质

金融体系的演进始终存在两种力量的互动：一种是市场主体基于逐利和创新本能产生的“自发性”秩序，如金融工具的发明、市场的拓展；另一种是国家基于发展战略和社会目标进行的“建构性”引导，如法律法规、监管框架、政策激励等。成功的金融体系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纯粹的自发性可能导致金融脱实向虚，加剧不平等和系统性风险，实际上，没有制度规范的金融市场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行为混乱必将导致金融关系失序和社会信用崩溃。但过度的建构性则可能抑制金融活力，扭曲资源配置，甚至产生腐败温床。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推进，正体现了在中国语境下对这两种力量的协同运用：一方面，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发挥金融活力，激励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另一方面，通过顶层设计、监管指引、货币政策工具（如再贷款）、财政贴息、考核评价等建构性手段，形成规范性制度，维护有效的金融秩序，并将金融资源引向国家和社会亟需的领域。其中，社会金融是建构性更强的秩序场域，通常需要政府的维护，包括制度安排的鼓励性优惠。

2. 社会金融文章：适应性效率与社会性目标

按上述逻辑，写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核心在于处理好“适应性效率”与“社会性目标”的关系。适应性效率指金融系统随技术和环境变化而创新、学习、进化的能力，这是其保持长期活力的基础；社会性目标即前述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等社会使命或社会责任。两者之间存在张力：过度强调短期社会目标（如指令性信贷）可能损害金融机构的自主性和风险定价能力，削弱其长期适应效率；而完全放任市场，则社会性目标可能因正外部性和市场失灵而无法实现。因此，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协力机制：政策框架应致力于为金融服务社会目标创造激励相容的条件，例如，通过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发展普惠金融科技、建构养老金融优惠政策等方式，将社会效益内化为金融机构可评估、可管理的商业机制，从而调动市场主体自愿自主实现社会使命的积极性。

3. 当代中国金融发展须写好多维关切的“五篇大文章”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中，写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多维关切、统筹推进：在科技金融上，需构建覆盖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让金融敢于陪伴“硬科技”企业穿越“死亡谷”；在绿色金融上，需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强化信息披露和环境风险压力测试，丰富碳金融市场产品，使绿色从“加分项”变为金融决策的“必选项”；在普惠金融上，需依托数字技术深化“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破解小微主体缺信息、缺抵押的困境，同时防范“过度负债”等风险；在养老金融上，需加快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规范发展养老理财、储蓄等产品，推动养老产业与金融深度融合，为“银发经济”提供稳定支撑；在数字金融上，需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筑牢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和金融稳定的防线，规范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确保数字红利普惠共享。

这“五篇大文章”彼此关联，必须协同推进，不可偏废：数字金融为前四者提供技术赋能；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推动产业升级，为普惠金融创造更优质的客群，为养老金融积累更丰厚的资产；普惠金融则应

致力于维系社会稳定的基层盘。

4. 企业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书写金融“五篇大文章”作出创新性贡献

金融机构和企业是书写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微观主体。具备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企业,不是将秩序规则视为被动接受的监管条规,而是将其视作战略转型和创造共享价值的重大机遇。例如,商业银行可设立专业部门,开发特色产品;保险公司可创新绿色保险、普惠保险、养老健康保险;投资机构可将 ESG (环境、社会、治理)因素深度整合进投资决策;金融科技公司可利用技术优势,降低服务成本,扩大覆盖范围。企业的创新实践,是政策蓝图落地为具体社会效益的关键环节。

5.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关切,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两岸金融协作可为此作出特别贡献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融合合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统一、社会长治久安,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特殊且关键的战略目标,更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这是关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时代使命。金融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的先行者和黏合剂,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两岸在金融领域各具优势:大陆市场广阔、政策推动力强、数字金融应用场景丰富;台湾在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如长期照护保险)、科技金融(如半导体产业融资)以及精细化金融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两岸金融协同创新,可以为写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注入独特活力,并直接服务于两岸融合的社会目标,例如:在科技金融领域,可共建两岸创投基金,支持两岸青年科技创新合作,特别是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进行领先世界的开拓发展;在绿色金融领域,可共同开发适用于两岸的气候投融资产品,推动绿色产业链合作,分享 ESG 管理经验;在普惠金融领域,台资金融机构可利用其服务中小企业的经验,结合大陆的数字生态,更好地服务大陆台商和本地小微企业;在养老金融领域,可借鉴台湾在长期护理保险和养老社区金融方面的经验,合作开发适合大陆市场的养老金融产品与服务;在数字金融领域,可在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数字货币应用、跨境支付便利化等方面开展试点合作。

通过设立两岸合作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统一或协调金融标准、建立信息共享与风险处置机制等“建构性”安排,引导两岸金融资本“自发性”地流向共同关切的社会领域(如两岸青年创业、台胞大陆安居、产业链绿色发展、两岸老人福利和优待等),以有效的金融方式促进两岸共同关切的社会目标实现。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金融协作,不仅能创造经济价值,更能增进两岸民众的福祉与相互理解,累积社会互信,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与社会基础,这本身就是金融社会使命最深刻、最生动的体现之一。可以说,深化两岸金融协力创新是当前金融发展重要的社会使命,直接服务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国家核心利益和最大社会关切。

五、以金融“五篇大文章”拓展金融强国发展的更大空间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认识到:在“商业金融-社会金融”系统中,金融“五篇大文章”倾向于具有高度的“社会金融”性质。“十五五”规划将“五篇大文章”纳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相关部署,从分散支持走向体系化布局。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总体目标和实施路径。金融“五篇大文章”以系统性、前瞻性的战略视野,正在为金融强国建设拓展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提出,标志着我国金融发展进入了一个商业金融、社会金融相协同的新阶段。

从本质上看，“五篇大文章”各自承载着独特的战略功能，又相互交织形成有机整体，并与商业金融相契合，共同构成了适配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金融强国生态体系。科技金融推动“创新赋能”，旨在破解科创企业从孵化到产业化全周期的融资难题；绿色金融着眼于“低碳导向”，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普惠金融体现“金融共享”，致力于形成金融服务的社会普适环境；养老金融适应长寿时代的“民生保障”新要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世纪挑战；数字金融顺应数字化“科技革新”的大趋势和新形态，形成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拓展服务边界和加强精准运行的新引擎。

这“五篇大文章”不仅分别对应着我国经济结构性转型的大趋势——创新驱动、低碳转型、共同富裕、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升级，而且形成建设金融强国的强大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系统要着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不仅提出了新时代金融工作的重点任务，而且明确指示了中国特色金融强国之路新的拓展领域，也彰显了党中央对金融强国建设的系统谋划。对应于本文第三节关于增进经济效率与社会福祉的社会金融性质分析，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金融“五篇大文章”不断扩展金融强国发展空间的潜能。其中，以下方面特别值得深刻认识：

1. 科技金融：位居“五篇大文章”之首，为创新驱动拓展探索和发展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驱动力。科技金融通过构建差异化的金融产品体系、风险分担机制和估值模式，打通创新链、资金链、产业链的衔接通道。在政策层面，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进金融服务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统筹运用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枢纽作用，着力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还要发展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天使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在实践层面，由于其所具有的内在扩展潜力，科技金融近年来已取得显著的发展成效：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银行资产占整个金融机构资产的90%，通过创新信贷模式和运用金融科技，银行正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科技金融的深度推进，正在为科技创新拓展前所未有的资本空间，让资本敢于投向原始创新、敢于陪伴企业成长、积极培育科技明星企业；同时，资本承担风险也获得相应利益，包括可观的财务回报。

2. 绿色金融：为低碳转型拓展制度空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在全球气候治理加速推进和国内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绿色金融通过指向明确的政策引导和市场化机制，将金融资源从高碳领域引向低碳领域。《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先立后破”，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统筹对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的支持。应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金融精准支持提供依据；引导金融机构将绿色低碳转型因素纳入资产组合管理考量，丰富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产品服务。目前，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截至2025年9月末，绿色贷款同比增长22.9%，显著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绿色金融不仅为绿色项目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而且通过信息披露、环境风险评估等机制，推动企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形成“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反哺金融”的良性循环。绿色金融的深化发展，正在为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拓展出更加广阔的制度空间，使高质量发展具有可持续的生态环境支撑，为人类发展作出中国的突出贡献。

3. 普惠金融：拓展全民共同富裕空间，让金融资源惠及更多长尾群体，促进社会公平

普惠金融特别关切的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三农”则是金融服务须特别关注的领域。普惠金融通过下沉服务重心、创新服务模式、降低服务成本等方式，将金融服务延伸到小微企业、街边小店、县域乡村，不仅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举措，更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金融政策安排。《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应健全多层次普惠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优化普惠重点领域产品服务供给；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动普惠小微贷款增量、扩面、提质；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提升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对残疾人、退役军人、新市民等群体就业就学的金融支持力度。截至2025年9月末，普惠贷款同比增长11.2%，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深刻改变普惠金融的服务模式，包括整合物流、税务等多维数据优化授信模型，建设小微金融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等。普惠金融的持续完善，正在为推进共同富裕拓展出更公平、更可及的社会金融服务空间。

4. 养老金融：为银发经济和老年照护拓展关切空间，加快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多元化。养老金融通过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拓宽养老资金投资渠道、完善养老服务金融配套，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持续完善养老金融相关政策，强化银发经济金融支持。应加快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加强养老资金投资管理，推动实现养老金稳健增值；大力发展商业保险年金，并与健康、养老照护等服务有效衔接，保障老年人合法金融权益。截至2025年9月末，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58.2%，在各领域中增速最高。央行已设立5000亿元服务消费和养老再贷款，金融机构养老金融产品超过1200种。养老金融的快速发展，正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促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出不断探索创新的社会金融发展空间。

5. 数字金融：为转型升级拓展技术空间，成为提升金融服务效率、拓展金融服务边界的有力引擎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驱动下，金融服务的形态、流程和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数字金融不仅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的物理网点限制，更通过大数据分析构建精准的信用评估模型，减少了对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增强数字化经营服务能力。应加快数字金融创新，支持巩固和拓展数字经济优势，建立健全应用便利、安全高效的数字支付服务体系和数字金融治理体系，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数字金融是其他四篇金融“大文章”的技术支撑，数字技术赋能金融服务有多条路径，包括：建立大数据集为企业识别画像，利用工业互联网和产业知识图谱提升数据采集分析能力，运用技术手段识别环境风险、优化绿色金融服务等。截至2025年9月末，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2.9%，余额达8.6万亿元。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在为金融业的整体转型升级拓展出无限的战略性技术空间。

综上所述，拓展金融强国发展空间是一个系统工程，“五篇大文章”的协同推进，通过资源整合、功能互补与风险共担等方式，形成面向实体经济的复合型金融支持体系，相互支撑、彼此赋能，共同构建起一个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商业金融与社会金融相契合的）完整金融服务系统。《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7年，金融“五篇大文章”发展要取得显著成效，重大战略、重点

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融资可得性和金融产品服务供需适配度持续提升。“十五五”期间,金融工作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通过持续深化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基本形成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金融支持体系,使金融资源配置更加精准有效、制度机制更加成熟完善。

总之,金融“五篇大文章”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抓手。从科技金融到绿色金融,从普惠金融到养老金融再到数字金融,每一篇“大文章”都在各自的领域内为金融强国建设拓展着新的发展空间,共同构成金融强国建设的立体化战略格局,进而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迈向金融强国的征途上,“五篇大文章”的推进正在书写中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的崭新篇章。

六、结语

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提出,是对传统金融使命观的一次深刻拓展与升华,其根植于经济学范式从“微观-宏观”向“微观-宏观-域观”演变的认知基础升华,源于货币金融功能从追求狭义经济效率向增进广义社会福祉的内在逻辑延伸。“五篇大文章”共同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社会金融”发展的战略框架,其核心使命是引导金融资源系统性、结构化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社会包容、养老保障和数字治理等关键社会领域。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完成好这“五篇大文章”,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市场自发与政府干预的二元思维,构建一种能够有效权衡并协力“适应性效率”与“社会性目标”的金融治理新范式。这既需要顶层设计的清晰引导,也离不开金融机构基于社会责任的创新实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将两岸金融协作纳入这一宏大叙事,不仅能为金融“五篇大文章”带来独特的创新视角与实践经验,更能直接服务于国家统一——这一当前中华民族最大的社会关切,彰显金融在促进民族融合与社会和谐方面的深层潜力。

归根结底,金融的终极价值在于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持久繁荣。金融“五篇大文章”的社会使命,正是要求金融体系回归这一本源,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强劲正能量。这是一条充满挑战但也孕育着无限希望的道路,其成功实践将为全球金融体系的进步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特别是,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推进,直接服务于中国当前最大的社会关切和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金融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作为社会金融所具有的社会使命和重要意义,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持续研究的重大课题和深入观察的经济领域。

参考文献：

- [1]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徐毓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 米什金. 货币金融学[M]. 蒋先玲,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 [3]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M]. 周黎安, 译.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 [4] 王广谦. 金融中介学[M]. 3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 [5] 陈雨露. 以金融强国建设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红旗文稿, 2023 (24): 11-15, 1.
- [6] 郑秉文. 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 2022——账户养老金与财富积累[M].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22.
- [7] 徐忠, 邹传伟. 金融科技: 前沿与趋势[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0.
- [8] 屠光绍. 金融“五篇大文章”与金融强国建设任务[J]. 国际大都市发展研究(中英文), 2025, 2 (1): 5-15.
- [9] 金碚. 论社会金融和社会企业的经济学逻辑建构[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 (1): 25-35.
- [10]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 金融“五篇大文章”: 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与国际比较专题研究报告[R]. 2024.
- [11]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养老保障等重点领域

发展的指导意见系列文件 [Z]. 2023–2025.

- [12] Stiglitz J 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ial markets[C]//Bruno M, Pleskovic B.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1994: 19-52.
- [13] Scholtens B, Van Wensveen D. A critique 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0, 24 (8): 1243-1251.
- [14]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The financial system we need: alig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 Nairobi: UNEP, 2015.
- [15] Demirgüç-Kunt A, Klapper L. 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 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R]. Washington D. C. :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025, 2012.

The Social Mission of the “Five Priorities”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JIN Be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Summary: The Central Financial Work Conference in 2023 introduced the “Five Priorities”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namely technology finance, green finance, inclusive finance, pension finance, and digital finance. This initiative marks a new stage in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e guided by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missions. First, this paper traces the narrativ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miss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trajectory begins with the classical view of monetary neutrality, proceeds to the micro-macro dual framework grounded in Keynesian monetary non-neutrality theory, then moves to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ools targeting growth,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and finally arrives at the “domain-perspective economics” paradigm embedded in specific social domains. This evolution highlights the growing social attributes of finance. Seco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logic through which monetary and financial functions have shifted from enhancing economic efficiency to promoting social welfare. It argues that the “Five Priorities” essentially represent a systematic expansion of financial functions in serving broad social objectives in the new era, thereby laying a practically coherent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social finance” domain. Finally, ground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ntaneous market forces and constructive policy guidance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It proposes that delivering on the “Five Priorities” requires a synergistic alignment of adaptive efficiency with social objectives. In this process, enterprise innovation driven by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Meanwhile, cross-Strait financi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shared concerns can make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is grand social finance practice.

Keywords: the “Five Priorities”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social mission; social fin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G20, G28, O16, Q5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6)04-0001-11

(编辑:朱 艳;刘仁芳)